

统战工作，也是在战斗^①

讲述者

梁茂鸿（1914—2004），中山黄圃新地乡人，少年时代在广州读书，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，出版抗日宣传周刊，参加抗日宣传游行，被反动政府逮捕，第二次“国共”合作后出狱。1938年后，往返香港、中山两地，从事教育事业。1943年，赴五桂山区参加游击队，被组织派往十区陈十顷及四区竹舟麻子村一带配合地下党活动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返回黄圃继续从事统战工作，以开设经营“丽华”文具百货商店为掩护，协助地下党工作、销售进步书刊、散发党的宣传材料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黄圃镇委员会副主任、副镇长等职。后受政治运动冲击，被组织停止工作。1988年恢复国家干部身份，享受离休待遇。

因宣传抗日入狱

1935年，北平掀起“一二·九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，中国南方各院校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。广雅中学同学不甘落后，立刻组织“广雅抗日救国会”，我任大会主席团成员。我所在的36届高（三）班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示威游行。事后，广州反动当局派宪兵司令利树宗率兵驻校，监视学生，又以组织救国义勇军为名，企图欺骗同学参加，但被大家拒绝。同学们纷纷离校下乡宣传抗日。我则到了香港，通过《大众日报》，刊登了抗日救国稿件。在此，我经该报编辑任毕明介绍，认识了中山大学进步教授何思敬及“中大”抗日救国学生首领曾振声（曾生）。广州荔湾发生警察

^① 原载于《中山文史》第二十三辑，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。原标题为《党指导我参加革命活动》，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屠杀学生事件后，我因参加了记者招待会而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。

这时，我知道广雅中学校方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意旨，开除了10位同学（包括我在内）的学籍。得到何思敬教授的协助，我获准转往广州八桂中学读书。临行时，何思敬把中共中央发表的“八一宣言”给我们看。宣言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我觉得内容诚恳，便接了一捆带回广州，投寄给市内各校学生会，又亲自送给一些知心同学。因为此次行动，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，判5年徒刑。狱中，我被刑讯逼供，扣着手镣吊“飞机”，几至昏厥。关在暗无天日的黑室半年多，我才被押送到南石头监仓坐牢。

1937年7月7日，全面抗战开始，国共第二次合作。释放政治犯时，我被保释出狱。在番禺教了一学期书后，接到曾生从香港来信，邀请我到海华中学教书。该校是惠东宝安人民游击队在香港开办的，也是该队的联络站。我应邀赴教。我们教的是战时的课本，体育课则教学生们军事操练、防空、防毒知识和实地演习。校内挂着革命导师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画像。我们教学严格，因人施教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。学生热爱祖国，进步很快。有时全校师生出动上街卖花卖旗，所得收入及捐款全部汇给陕北学校。

赴五桂山成为统战一兵

1940年，香港沦陷之前，我征得曾生同志的同意，返回家乡中山黄圃。1941年，我找到抗日游击队——梁伯雄大队，与该大队政委郑文^①取得联系。他指示我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，做统战工作，收集日敌情报。以后，都是由他联系我，直至1945年5月23日（农历4月12日）事变他牺牲为止。1949年方群英安排黄锡和、吴添带与我联系，直至中山解放。

1942年初，同学郭大同（曾任广东省石化厅副厅长）和他爱人李紫英来黄圃，在我家住下，要我设法介绍他到“挺三”第三支队梁自带处。我因与梁生疏，无法介绍，后以父亲的关系，介绍他与潘浩（鸡仔浩，“大天二”高佬惠亲弟）认识。经过磋商，他们在石岭与后岗之间办起岗东学

^① 郑文应为梁伯雄大队副政委。



郭大同（1913—2002），中山大黃圃三社人，曾任中共增龙博中心县委书记、增城沦陷区工委书记、刘震球集结队副中队长、两广纵队教育长等；解放后历任广东省冶金厅副厅长、广东工学院党委书记。

校。潘浩出面任名誉校长。我们安排数名进步教师任教。在郭大同夫妇的领导下，该校全体教师辛勤努力，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，有的同学还参加了抗日游击队。由于岗东学校办出成绩，引起潘浩的办学兴趣，以后他又出钱支持大濬、将军、对甫，黄圃等学校。我和郭大同便掌握时机，向潘浩建议成立了中山县九区教育促进会，团结了当地知识阶层。岂料，该会成立后，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，郭大同即被调走。我和李紫英也跟着去了五桂山。

郭大同到五桂山后，任刘震球中队中队长，负责政治班训练学员。我参加了政治班的学习，结业后留队工作。日、伪“十路围攻”五桂山区前夕，我和榄边集结队陈秋帆奉命乔装商人，到石岐搜集伪独二旅彭济华部进攻山区的军事情报。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前，山区部队决定把歼灭伪独二旅作为义勇大队成立的献礼，曾派人各种乔装，深入侦察敌情。刚好这时我在榄边参加七乡乡长座谈会，得到了情报：小隐关一名伪江防队员要求携械投诚。我马上见他，问明原委后即带他到山区部队。后来部队根据侦察到的和投诚伪军所提供的敌情，派出武装小分队，提前一天运动到小隐关敌人驻地附近埋伏，伺机行动。夜袭时，投诚的伪军又作向导。由于党的正确领导，部队同志英勇战斗，结果这次出击小隐关3个碉楼，取得攻陷两个的胜利。

回乡策反舅父

在这以后，我请假返回黄圃，与郑文政委联系。他要求我继续做统战和收集日、伪敌情。吴兆华是我舅父，他的部队驻防陈十顷一带。陈十顷是五桂山区通往东江的交通要点。如把吴兆华统过来，对抗日是很有好处的。为此，我曾往舅父处察看情况，又介绍郑文与我舅父相识，还同郑政

委到新张沙、民众一带察看地形。事后，郑政委要我混入吴兆华部队做工作。但我舅父受反动思想影响太深，难以争取他转变立场。于是我向他的堂弟吴洪根做工作。经向吴说明来意，他表示要走抗日之路，我就带他往牛角会见郑文政委。吴兆华来黄圃治病时住在我家里，郑文亦亲来向他做抗日统战工作。我舅父态度有所转变。不久，“市桥皇帝”李塋鸡汉奸军大举进犯中山九区，区内所有武装力量奋起抗敌，我舅父即着我领其队伍到十区三墩，交由郑文指挥，配合作战。结果此役取得攻打孙岗伪军的胜利，把李塋鸡部队赶出了九区。

后来，郑文政委又着我发展吴兆华。我和刘源昌到了陈十顷吴洪根中队处，驻在麻子村竹舟山泰生围小围馆，接着与中山人民抗日义勇队取得联系。山区爆炸队计划炸毁梁洪炮楼时，孔雀队的李光也曾把我的小围馆作立足点，侦察梁洪炮楼的地形。围攻山区时，吴兆华部队也被调派往攻打五桂山。我和刘源昌只好随队前往，负责运输伙食后勤工作。但我沿途注意随时向山区部队输送情报。到达濠头村口大树下时，果然遇到山区武装队员甘生同志。我们就把所知军情告诉了他。

回陈十顷后，我们的行动已引起高佬惠与刘子述的注意。他们写信来向吴兆华提出警告，要他提防我们像秦炳南^①那样叛变。为此，我们不敢多留，即刻返回黄圃。我得到舅父舅母及亲友资助的几十万元，开设了“丽华”百货商店，仍想为党做一些工作。

1945年5月23日（农历4月12日）事变后，郑文政委被反动派逮捕。这时，我不敢露面，只好通过我哥哥梁锡鸿和刘瑞昌送些衣服及药物给他。当天晚上，他惨遭杀害后，我曾四处寻找他的尸体，结果在尖峰山下（现农中礼堂后面）找到了。我和刘瑞昌备了棺木，把他安葬了。

^① 秦炳南（1916—1945），广西人，原是一十九路军连长，1932年在上海参加过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，是一位爱国军人。后参加“挺三”部队，任过“挺三”暂编第五支队大队副。1944年11月17日，被我党成功策动，率部起义，投诚到中区纵队。后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副团长。1945年2月6日，率部在高明合水、复楼一带与顽军发生“凤凰山战斗”，不幸被捕遇害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对澳门的统战工作

香港沦陷后，澳门成了战火中的孤岛，社会治安十分混乱。随着五桂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，与中山相邻的澳门当局出于遏制土匪及日、伪势力的需要，希望五桂山抗日武装力量给予配合和帮助。

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经请示后，决定利用澳门中立区这一特殊环境，与澳门当局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，以拓展珠江敌后的空间。遂先后派郭宁、黄乐天、梅重清等到澳门与澳门当局协商，达成四项协议：1. 双方互相协作，打击骚扰澳门之敌军、土匪，共同维护澳门治安；2. 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到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，包括发动爱国人士进行募捐、收税、筹集抗日经费；3. 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资，如弹药、医药及其他设备；4. 允许五桂山部队输送小量伤病员到澳门治疗。

按此协议，五桂山游击队协助澳门当局捉拿了“挺三”屈仁则派到澳门打单勒索、搜集军事情报的特务“老鼠精”（绰号），维护了澳门外围的治安。义勇大队在澳门建立的秘密办事处，为部队开展募捐筹款，团结和动员澳门同胞参加抗日，在军需给养、医疗卫生、交通联络等方面为支援抗战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。

（摘自《英雄儿女各春秋——中山人民抗日斗争图志》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。）